

陈静梅 ○ 著

现代中国 同性恋爱话语译介及 小说文本解读

XIANDAI

ZHONGGUO TONGXING
LIAN'AI HUAYU YIJIE JI XIAOSHUO WENBEN JIEDU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陈静梅 ○ 著

现代中国 同性恋爱话语译介及 小说文本解读

XIANDAI

ZHONGGUO TONGXING
LIAN'AI HUAYU YIJIE JI XIAOSHUO WENBEN JIEDU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现代中国同性恋爱话语译介及小说文本解读 / 陈静梅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643-2416-2

I. ①现… II. ①陈… III. ①同性恋—小说研究—中国—1910~1949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2632 号

现代中国同性恋爱话语译介及小说文本解读

陈静梅 著

责任编辑	杨岳峰
助理编辑	罗小红
封面设计	何东琳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 编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7
字 数	20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2416-2
定 价	2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独有佳人非女”：《品花宝鉴》的男男情欲叙事	(26)
第一节 “独有佳人非女”	(27)
第二节 替代与寄身的幻想化空间	(33)
第三节 榜样型的鉴赏物	(42)
第四节 女性化书写的文化根源	(50)
小 结	(60)
第二章 民族国家想象与性的现代规范（上）	
多音并存：20 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同性恋	
话语译介与生产	(63)
第一节 同性恋爱话语在民国出现的背景	(65)
第二节 外来学说在期刊中的对话	(75)
第三节 张竞生的“美育”观与同性恋译介	(84)
小 结	(90)
第三章 民族国家想象与性的现代规范（下）	
单音独奏：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同性恋	
话语译介与生产	(92)
第一节 否定与肯定态度的直接交锋	(93)
第二节 病理化诠释过程的演进	(101)
第三节 病理化诠释的定型	(106)
小 结	(111)
第四章 追寻男性主体：男作家的同性情欲想象	(117)
第一节 漂泊男儿的颓废之爱	(120)

第二节	同性情欲舞台上的性别之争	(132)
第三节	重整性/别秩序与国族想象	(141)
小 结		(153)
第五章	难言的爱：女作家的女女情欲书写	(155)
第一节	庐隐：挣扎于逾越与禁锢之间	(159)
第二节	凌叔华：与他者的性/别协商	(171)
第三节	丁玲：知识女性的孤独探寻	(177)
小 结		(190)
结 语		(193)
参考文献		(201)
附 录	主要参考的期刊报纸类文献（1949 年以前）	(215)
后 记		(218)

引言

一、选题说明

五四时期，伴随个性解放的呼声，众多文学作品借助对情欲的书写营造出一个空前解放的爱欲空间，由此开始现代时期中国人对性问题的重新认识与思考。正如文学史家王德威教授所言：“小说中的情欲述作常为我们揭橥许多重要的课题：明显的例子如男女性别与权力的认知；恋爱‘自由’、悔婚离婚抗婚的‘革命理论化’、乃至爱国逻辑的建立。”^①在这方面，西方性科学^②理论的影响是开启新知的重要资源。然而，同性恋爱作为一种情欲表现形式，究竟在这一公共言说空间中处于何种状况？这一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看到，文学史研究中对此缺乏详细的讨论与反思，一些论者对此也总是存而不论，甚至视而不见。本书关注的是，同性恋爱作为一种话语，是如何从西方引入中国，并基于现代时期这一时代背景，探讨五四时期的性学思潮译介与小说中的同性恋爱书写的关系。我希望从这里进一步考察，文人们如何利用“性”（sexuality）^③

① 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8年，第183页。

② 性科学（sexology）是以性医学、性心理学和性社会科学组成的一个综合的、全面的、多学科的理论体系，其研究对象包括性行为、性欲和性文化等。性科学一词最早为德国医学家I.布洛赫（Iwan Bloch）在1906年首先使用。德文原文为sexual wissenschaft，后译为英文sexology，简称性学。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科技编辑组编，《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页。

③ 性（sexuality）不仅指性行为，还指与性有关的经验、文化、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等方面。它牵连着生理性别、性倾向、性别角色、性欲望、性感受、感情和记忆等因素，对个体在人生的各个阶段进行自我界定均有着影响。（参见苏红军、柏楦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4页。）本文除了特别注明外，均在此意义上使用此概念。

这一思想资源参与更广泛的文化对话，进而影响人们的自我塑造。

本书将涉及几个重要的概念：同性恋、同性恋爱、情欲、话语。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中，这些词语往往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所以，有必要就本书使用它们时的定义与内涵先做简单的说明。

同性恋——在本书脉络里是英文 *homosexuality* 的中文对等词，其含义是指性取向指向同性的个体之间发生的性交或恋爱行为。在英文中，*Homosexuality* 于 1892 年出现，由名词 *homosexual* 派生，*homosexual* 即现代汉语所谓的“同性恋者”。*Homosexuality* 英语原意解作以下两种含义：① 作为一个 *homosexual* 的特质或状态；② 与性别相同的个体进行的性欲行为。^①在现代汉语中，“同性恋”单从字面意义看，强调的似乎是同性别个体之间的恋爱行为，我们并不能看出它包含性取向的意思。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对“同性恋”的定义，即同性别的人之间的性爱行为。^②因此，有学者提出，*homosexuality* 翻译为“同性恋”其实是一种误译，它更适宜译作“同性性交”或“同性性取向”，以表达其与“恋爱”的区别。^③不过，正如性学家邵长庚所言，目前性工作者已习惯地或约定俗成地认为，“同性恋”除了“同性间的相互依恋外，还主要包括有性行为，而且更指绝对同性恋者之间的性行为。同性恋者即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为同性者。”^④以此为基础，在本书脉络里，“同性恋”概念蕴含着病理化的意义。

同性恋爱——本书指相同性别个体之间发生的恋爱行为。在民国时期，“同性恋爱”、“同性爱”、“同性恋”有时都是英文“*homosexuality*”的翻译词，而“同性爱”与“同性恋”又常常是作

-
- ① 潘国森：《从语源学和语义学看“*homosexuality*”的中译谬误》，载《中国性科学》2004年第2期，第6页。
-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第5版），第1368页。
- ③ 潘国森：《从语源学和语义学看“*homosexuality*”的中译谬误》，载《中国性科学》2004年第2期，第7页。
- ④ 邵长庚：《关于“同性恋者”一词使用的思考——读“从语源学和语义学看‘*homosexuality*’的中译谬误”一文》，载《中国性科学》2004年6月第13卷第6期，第46页。

为“同性恋”的缩词在使用。相比较而言，在民国时期，“同性恋”与“同性爱”两个词语的使用频率大于“同性恋”，并且，基于西方性学译介进入中国时，“同性恋”一词所具有的病态含义并非立即固定下来，因此，“同性恋”及其缩词“同性爱”很多时候主要是指发生在同性之间的恋爱行为，并不包含个体的性取向的意思。本书除特别注明外，“同性恋”及其缩词“同性爱”，主要是指同性别个体之间发生的恋爱行为，与蕴含病理意义的“同性恋”概念相区别。

情欲——本书在广泛意义上使用“情欲”概念，即或指纯精神的情爱或包含性欲表现的情爱。情与欲并非截然二分的概念，夏志清即言：“‘情’与‘欲’在实际生活上是相当难区别的，‘情’可能是‘欲’在种种文化诱力制裁下变相而产生的东西。”^①

话语——本书在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强调的意义上所使用此概念，即“话语”是一种在书写、阅读与交换中展开的实践活动。“话语”本来是一个现代语言学的概念，英文形式为“discourse”，它最初指构成完整单位的、大于句子的语段。结构主义与新批评学派随之将这一术语应用到文学批评之中，例如新批评学派提出了“小说话语”和“诗歌话语”的区分，强调各种“话语”确立了文类特征并标明了此一文类与另一文类的差异。^②这种观念具有浓厚的形式主义色彩。福柯从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将以往对话语的形式分析转移到话语与权力关系的历史研究上来。他提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性，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物质性。”^③福柯关于话语与权力的论述，颠覆了传统的知识论和真理观，他深刻地指出了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共谋

① 夏志清：《爱情·社会·小说》，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第10-11页。

② 南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75页。

③ 福柯：《话语的秩序》，肖涛译，载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关系：“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①在这种观念下，语言不再被理解为透明的工具，它同政治性与制度性的结构、社会规范、文化价值与信仰有着复杂的联系。本书对同性恋话语的探讨，并非意味着否认身体、性等事物在现实层面的存在，而是强调这些事物只有在话语性的矩阵（matrix）中才能被看见、被理解、被言说。

本书研究的现代时期，主要指的是晚清至 20 世纪 40 年代这一时间范围。当然，同性恋现象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或文学表现，并不始自现代。本书之所以选取此一时间段进行论述，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即同性恋现象虽然一直存在于历史之中，但“同性恋/homosexuality”这一名词却是 20 世纪初随着对欧洲性学理论的翻译才在汉语中“诞生”。这一时期根据欧洲性学文本最终所形成的关于同性恋现象是变态的主流观点，影响其后数十年，包括当代仍然普遍存在的对同性恋行为的歧视态度及看法。因此，本书将研究的时间范围界定在这一时期。

正是基于“同性恋”新名词在现代时期的出现与性学理论的输入有关，所以，本书才将小说中的同性恋书写与同性恋思潮译介并置进行讨论。这种讨论将在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本书关注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英文“homosexuality”如何翻译为现代汉语的“同性恋”的问题，而是考察原本在古代汉语中不存在的“同性恋”这一词语，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它如何对等于作为表征一种现代科学观念的“homosexuality”。也就是说，这一新词语在“性”这一层面，如何引发人们调动自己过去、当下的思想资源和外来资源，共同来阐发、想象并建构了对身体/性问题的现代认识。其次，本书将考察文学创作围绕同性恋题材所展开的想象，以及这种想象与译介过来的性学观念是否存在矛盾或协商，从而进一步深入探讨现

①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第 29 页。

代中国“同性恋”意义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碰撞或冲突。

以上两个层面的探讨，实则蕴含这样两层意思：第一，在现代时期，人们对同性恋现象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探讨，这是“同性恋”这一新名词之所以会在现代汉语中“诞生”的基础；第二，这一过程也意味着个体的性欲被人们纳入了对之进行命名、区分（类型）与管理的过程之中，而这一过程亦是关于现代自我的认知建立的过程。

人们在现代时期对于同性恋现象进行重新认识，是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背景相呼应的。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受内忧外患困顿局势的刺激，从政治场域到文化层面均出现了有关性、性别、婚姻等问题的改造活动，除却重新认识同性恋行为外，还包括如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婚姻改革、打造新性道德等观念及实践的倡导，其规模与热情都是过去的历史中很少见的。这些牵扯个人身体的“改造”，均与这一时期正向现代迈进的个体力图重新探索并塑造自己的角色和人生意义密切相连。

毋庸讳言，任何时代的历史或文学都与“人”相关，然而，“个人”观念却并非亘古就有，而是与历史境遇有着密切关系。20世纪是中国迈入现代社会的历程，现代主体身份的确立无疑是文化以及文学最为关切的意義追求：一方面，传统社会制度和伦理结构瓦解，我们的社会角色本身不再能提供道德评价的客观基础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条件；另一方面，对传统伦理制度的反叛伴随着新的自我观念的产生，即我们普遍地相信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本质或我们的自我，而这种内在的本质显然与我们的实际社会状态相脱离。^①那么，个体对自我的思考，亦即寻求主体性建立的过程，该过程不仅要能让“我对于我是谁”有所理解，它同时还应提供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说的自我认同建立的“视界或框架”，“在这种框架和视界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境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的或反对的。即，在其中，我能够采取一种

① 汪晖：《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

立场。”^①于是，西方启蒙精神影响下的主体观成为中国人学习“立人”的资源。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现代语境中个人观念的建构，还与对集体的归宿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若热·拉腊因(Jorge Larraín)在探讨第三世界的现代性问题时就指出，现代时期，对主体的形成发挥了最重要影响的因素是民族身份观。^②具体到中国而言，其“现代化过程的开端和现代性问题的起点都是从民族比较开始”^③。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则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视野出发，明确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启蒙的现代性与审美的现代性之间并非处于对抗状态：“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他由此提出“所有第三世界文本必然被……解读成我所称的国族寓言”。^④事实上，“即使当‘五四’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美学的现代主义那种艺术上的反抗意识声称相通时，他们并没有抛弃自己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信仰。”^⑤这种对启蒙现代性的无条件接纳，不但为我们思考意识形态与审美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本前提，而且这一现象也表明：对于现代时期的中国人而言，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与国家、民族身份的确认具有休戚与共的内在联系。因为当我们开始追问我们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总是在问：我们自己与自己身处的社会、国家、世界以至自然界的怎样关系？^⑥

在这一意义上，寻求现代主体身份的建构同时意味着是一套知

①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② Jorge Larraín, *Ideology and Cultural 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154.

③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96页。

④ 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载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5页。

⑤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78页。

⑥ 汪晖：《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页。

识、意义系统的建设过程。该过程不仅关乎对于自我的看法，还同时牵涉中国和未来，这就与“文化如何在诸群体内标出和保持同一性，以及在诸群体间标出和保持差异的各种问题密切相关”^①。“性”这一符码作为“自我”最根本的依附之身体的表现，必然被纳入到这一意义系统的建设中来。英国学者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 Joyce）即言：“定义主体性最主要的方法之一是解读关于身体尤其是关于性（sexuality）的话语。身体、性和其它形成主体性的话语的对象成为了‘个人’，但作为个人的主体却是与社会的东西的创造不可分割。”^②

如同女人作为男人的他者的构建那样，“同性性倾向”作为异性性倾向的对立面/他者被构建出来，新的（性）身份：同性恋者/异性恋者，也相应地被建构出来。由于主体的身上铭刻或编织着各种社会分类编码（诸如性别、性取向、种族等），而这些编码又涉及着不同的主体形貌，为了维持认同或同一性，就必须要有有一个可以代表普遍性以及理性的主体存在，因此，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有关现代主体的想象其实有着性向及性别区分，无论是“国家大我”还是“个体小我”，都明确指向着异性恋的男性主体。那么，这一过程如何得以完成？其间是否存在矛盾冲突？对作家的创作会否造成影响？本书即试图立足“同性恋爱”问题这一侧面，透过考察现代时期文化语境对个体的身体/性所赋予的意义及原因来进行回答。

二、选题意义

在西方学术界反思现代性的学术思潮推动下，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有关同性恋及其他性少数群体的研究成为了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文化研究学者坚持“承认的政治”

①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2 页。

② 帕特里克·乔伊斯：《社会史终结了吗？》，载《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李宏图等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年，第 26 页。



的立场，即“承认一切人以及一切群体的身份存在的民主政治”^①，将同性恋及其他边缘群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强调对性领域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与反思，能够帮助人们认识文化中各种不平等关系的意识形态构成和无意识影响。文化研究的发展为传统的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而文学研究如何更积极、有效地与当代思想、文化和社会语境展开对话，也成为学术领域关注的话题。学者王宁这样说道：“对于我们文学研究者而言，在坚持以文学（审美文化）为主要对象的同时，将其研究范围扩大，最终实现一种扩大了疆界的文化研究，它既可以保持我们自身的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同时也赋予我们开阔的研究视野，达到文学自身的超越。”^②

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本研究尝试对现代时期的同性恋话语译介与小说创作进行解读。笔者认为，这一研究的价值可以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梳理从 1910 年到 1949 年这一时期的译介文本，可以让我们对西方同性恋思潮进入中国语境的流变及影响有一个较为详细的了解。

对于当下的中国人来说，有关性问题的理论认知，主要是受到 20 世纪初叶引进的西方性学思潮的影响。然而，相对于中国古代的性文化、性存在已有的丰富研究而言，近现代时期性问题的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而关于这一时期的性历史，除了频繁地被人们提及的十里洋场的妓女（阶级压迫的象征）、刘海粟的人体模特事件（身体解放的象征）以及张竞生的《性史》（堕落的象征）之外，还有很多历史或被忽略或语焉不详。除此而外，由于近现代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文化发生极大变革的时代，目前发现的史料显示，性的叙述方式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从相关理论的输入到知识生产方式、传播方式以及受众都与前现代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研究这一时期

① 祁寿华、林建忠：《文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80 页。

② 王宁：《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思潮的走向》，载学术中国网，网址为 <http://www.xschina.com/show.php?id=10357>。

同性恋爱思潮的译介，不但可以为我们了解这一阶段西方性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提供一条切入的途径，而且它还可为我们对许多已发生的史实或史事，提供一个不同于阶级、政治及经济的阅读视角。

其次，笔者将译介文本与文学文本并置进行分析，考察彼此之间就同性恋爱问题进行的对话或竞争，也可以让我们从一个跨学科的视角来把握中国现代时期身体/性的知识生产情况。

学者王一川曾指出：“现代性，不仅是一个政治或思想问题，而且同时更是个人的生存体验问题。甚至说到底，直接地就是个人的生存体验问题。现代性是同人对自身的生存境遇的体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不仅以自己的政治活动去推动或阻挡现代性进程，也不仅以自己的思想活动去认识现代性转型，而且从根本上说，以自己的全部的生命和热血去体验现代性的痛感和快感、忧郁或希望、灾祸或幸福。如果离开了这种现实的活生生的生命体验，现代性就只剩下空洞的躯壳”。^①在这一意义上，译介文本如果能够使我们对现代时期身体的生成获得较为理性的认识，那么，文学独特的言说方式，将从感性层面带领我们进一步透过身体现象去管窥个人与社会、审美与政治、文化等因素之间的复杂纠葛。而作家如何看待个体的身体、如何理解情欲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会对作家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看待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作为一种想象活动，使得作家对审美感性经验的表达不可能完全成为时代之声的复制品，因此，个体体验和现代认同之间的罅隙、冲突乃至抵抗，自然会通过身体感性的表达呈现或隐藏在文本中。立足于此，将译介中的身体知识生产与文学所提供的这样一种审美感性的身体言说并置考察，不但有助于我们更为多角度地把握有关现代时期性的知识建构的复杂性，而且也不妨可视之为是对当今的历史、社科等领域的身体研究的一个回应。

最后，对现代时期同性恋爱话语译介及小说创作进行探讨，还

①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可以为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增添一个视角。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从女性主义立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论文专著可谓汗牛充栋,这当然有益于女性文化的建构。但是,“性别”也因此往往被视为唯一的分析范畴,从而忽视了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与其他范畴之间的关联性。因此,研究同性恋问题,正好可以从性领域为性别研究增添一个视角,从而将身体/性的存在,置于文化语境中各种存在之间相互关联的话语体系中进行考察,避免单纯地将父权意识形态或强制性的异性恋假设理解为唯一的压迫形式。

三、相关研究综述

本书论题的提出得益于当下西方同性恋研究的理论成果。中国近现代以来关于同性恋的“科学”认识,主要是在西方性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但是,不容忽视的是,20 世纪以来,西方有关同性恋问题的研究早已不再局限于医学、生物学等病理化层面的探讨,尤其是同性恋平权运动在 20 世纪 70 年代如火如荼地开展之后,同性恋研究随之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皆获得展开,其研究视点也从之前的视之为疾病的主流倾向,转向了将其作为一种正常的文化现象来看待。

就本书论题而言,为了更好地把握目前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及其不足,我们有必要对西方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这些研究的发展、变迁先进行了解。进一步言之,正是借助这些研究的启发,本书的讨论也因之获得理论的视野。然而,基于同性恋研究在西方各个学科领域皆有开展,并且,这些领域的研究又相互影响,由此形成了一个庞杂的系统,本书不准备对之进行面面俱到地介绍,仅就论题牵涉思考的情欲及性别问题(本书的分析涉及男男情欲与女女情欲),笔者主要选取几部具有研究范式意义的著作,同时兼及女性主义阵营内部就“女性”的性别身份与“女同性恋”性身份发生的争论,进行初步梳理。

(一) 同性恋研究及其理论的发展概况

西方的同性恋研究 (lesbian and gay study)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左右兴起, 与同性恋者以同性恋身份作为一种集体社会运动抗争是密不可分的。其中颇为关键的里程碑之一是在 1969 年发生的石墙运动^①, 在这个事件之后, 相关的同性恋社团纷纷成立。同性恋解放运动开创了西方社会较为宽容的环境, 同性恋学术研究也因此获得发展。概括而言, 从 70 年代以来, 同性恋研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 这是同性恋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以本质论立场为主导。所谓本质论立场, 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 它强调同性恋者这一身份具有跨越时空的有效性, 或者说强调个体的性取向是先天具有的, 因此它是跨越文化时空的客观事实, 可以独立于文化论述而存在; 其二, 它还表现为女 (同性恋) 与男 (同性恋) 在性别身份立场上的二元对立, 即人们同样假定了存在一个跨越历史文化时空的“女性”与“男性”本质。

代表性的人物例如美国的女同性恋理论家艾德里安娜·瑞奇 (Adrienne Rich)。她以《强迫异性恋与女同性恋的存在》(*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1980) 一文, 奠定其在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理论史上的经典地位。在这篇文章中, 她将“异性恋”视为政治机制加以批判, 指出其利用各种手段如贞操带、理想化异性恋罗曼史与婚姻等, 封杀艺术、文学与电影中的女同性恋者的呈现。她认为, 要想改善这种状况, 当务之急不仅是女人必须开始反抗男性的宰制, 更在于女人彼此之间相互看见情感连接与欲望流动的可能。她特别提出“女同性恋连续体” (lesbian continuum) 的观念来说明此种关系: “它包含各种女人认同女人的经验, 渗透了历史

① 石墙即 stonewall 酒吧。它是美国纽约格林威治村的一间男同性恋酒吧。1969 年 6 月 27 日, 当地警察在该酒吧逮捕几名未带身份证明的同性恋者, 并驱离顾客, 从而引发同性恋者的反弹行动, 连续 4 天在当地进行示威游行。这次事件被视为美国乃至全世界同性恋平权运动的起点。

上每个女人的生命，并非仅指女人曾有或自觉地欲求和另一个女人性交的事实。”^①

尽管瑞奇从性别立场定义女同性恋使其内涵显得宽泛，但对于女同性恋者在文化以及社会中能够被人们“看见”是有意义的，后来的女性主义者克莉丝·维登也给予了积极评价。她指出，该立场可以为“女同性恋的研究以及建构一种女同性恋传统的尝试的利益服务”^②。

第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转向以建构论立场为主。所谓建构论立场，即从强调“同性恋者”是本质性的跨历史时空存在物，转向思考性问题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社会意义、同性恋身份的建构等问题。

代表性的理论家譬如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哈波林（David M. Halperin）。他在1990年发表论著《一百年的同性恋：以及其他关于希腊式爱情的论文》（*One Hundred Years of Homosexuality: and other essays on Greek love*），在当时被誉为是“近10年来对男同性恋（gay）的历史研究最具贡献的著作”。^③在这部著作中，哈波林明确表示自己的目的，是向那些在同性恋问题上持本质论立场的研究者进行挑战。所以，他特意选择对一个似成定论的问题，即古希腊流行“同性恋”进行质疑。

作者从两方面展开自己的论点阐述。首先，他从理论上对“性”（sexuality）的意义建构过程进行梳理。他将分析视野扩大到整个古希腊的“社会—性行为”系统（social-sexual system），从性与性别两个方面展开，揭示出古希腊的“社会—性行为”系统的运作内涵，并不同于现代立足异性恋/同性恋二元对立划分的性系统。其次，他通过具体的文本实践，例如分析柏拉图《会饮篇》中的女祭司狄俄

① Adrienne Rich.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in *Signs*. No.5, 1980: 648.

② 克莉丝·维登（Chris Weedon）：《女性主义实践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白晓红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190页。

③ 有关此书的评论请参见网页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